

壹、前言

1895年，日本依據《馬關條約》取得了台灣。為了快速及有效地掌握台灣的情勢，日本內閣於1896年公佈第63號法律——《有關在台灣施行法令的法案》（又稱之為「六三法」），賦予台灣總督委任立法權。除了立法權之外，武官出身的台灣總督還擁有軍政、民政和財政的權力，同時還可任免司法官。與此同時，台灣的社會情勢，因為此一劇烈轉變而呈現日本人與台灣人，以及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二元衝突與對立。《馬關條約》簽訂後成立的「台灣民主國」，以及日軍登台之後持續不斷的抗日運動，則是此種二元對立的進一步發展。¹

台灣民主國是當時台灣島內有識之士，為了阻止日本占領台灣，於1895年5月25日所發起成立的。台灣民主國以台北為首都，國號「永清」，由末代的台灣巡撫唐景崧出任總統。²台灣民主國成立之後，日軍立即由台灣北部海岸登陸，以壓倒性的武力進攻。抗日軍的兵力薄弱，幾乎是毫無抵抗就潰敗逃跑。登陸後的第6天，日軍攻陷基隆。基隆失守的消息帶給台北重大的衝擊，敗退的守軍湧至台北城後，引發台北的混亂。台灣民主國的總統唐景崧，以及其他重要官員急忙逃向中國，民主國形同瓦解。6月7日，日軍無血進駐台北。6月17日，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的舊巡撫衙門（今中山堂）舉行「始政典禮」。

「始政典禮」之後，為壓制台灣全島，日軍積極展開南進作戰。1895年6月底，為了復興台灣民主國，南部的士紳在臺南設立議院，發行台灣民主國名義的紙鈔、郵票與公債。日軍向臺南進攻的途中，雖遭遇霍亂、瘧疾等各種疾病的侵襲，仍順利地於6月22日占領新竹，8月28日占領彰化。10月上旬，日軍決議以南下的部隊、中西部海岸及南部海岸三支部隊進行包圍臺南的作戰。各部隊向臺南集結的途中，雖遇到頑強的抵抗，仍步步往臺南進逼。10月20日，日軍無血進入台南城。雖然台灣民主國成立不到5個月就完全崩潰而覆亡，但台

¹ 從歷史發展的歷程來看，所有的社會體系受本身內在異質因素的制約，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會出現，社會內部會出現不同的二元對立（dualistic conflict）。例如，封建時期的莊園領主與農民，民族國家成立時期的貴族與平民，均代表某一時期某一社會的基本對立。而這種社會的二元性表現的最明顯的時期，是隨著產業革命的發展，資本主義滲透到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的二元性可說是由外地輸入的異質的社會體系與本土社會體系的衝突。Bocke (1953: 4) 在分析帝國主義國家將資本主義社會體系強加在印尼的傳統社會體系時，首先將社會的二元性作了上述的定義。

² 台灣民主國的成立，表面上看起來是台灣人自發性的抵抗運動，實則不然。民主國一方面將國號定為「永清」，表示對清朝不敢違背；另一方面也秘密接受張之洞（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軍事援助。

灣的武力抗爭並未就此罷休（黃昭堂，1970）。

另一方面，以吳湯興、徐驥、姜紹祖及邱阿六為主的台灣客家抗日軍，在桃竹苗與屏東六堆地區，均曾與日軍展開激烈戰鬥，也讓日本對於當時台灣島內的客家族群，有了第一次的正面接觸。而此次接觸經驗，也直接引起日本對台灣，以及對華南地區客家族群的注意，並著手開始在台灣島內進行調查。首先，台灣總督府成立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輯了《土地調查用廣東語集》，編輯簡易的客家會語，提供土地調查官吏與地方警察使用。此外，台灣總督府也透過各級公務機關，對台灣的客家族群進行人口數、分布、語言及產業的數據調查。

此一系列的調查活動，台灣總督府不僅獲得有利於統治的實質數據，也帶動了日本學術界對台灣研究，乃至於客家研究的興趣。在另一方面，對台灣進行實質統治的同時，日本也逐漸將其帝國主義的勢力，朝向中國華南地區發展。而其關於客家的相關研究，也開始以華南的廣東、廣西與福建地區的客家族群為主要對象。

1932年，日本外務省對中國廣東地區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並出版了《廣東客家民族の研究》調查報告書。這本29頁的小冊子，原本是以「職務參考資料」的形式，印製給日本政府的公務部門，作為處理中國相關事務時的參考資料。這本冊子的主要內容，包括了廣東客家族群的由來與發展、人口的數量與分布狀況、語言與文化特徵、生活方式與職業，以及當時重要的客家菁英人物。因此，雖然只是一份調查報告書，卻可視為戰前日本對客家族群最完整的basic認識。

戰後初期，身為戰敗國的日本，對於過去殖民地的相關研究，抱持著謹慎與自肅的態度。無論在調查報告亦或是學術研究，都未能有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中國、韓國、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等過去的殖民地區，在日本政府的自我克制下，被日本學術界視為研究的禁地。然而，到了1960年代中期之後，日本經濟的蓬勃發展與東京奧運的成功，讓日本社會完全走出戰後的陰影，部分學者專家開始從歷史學、民族學、社會學、語言學等研究途徑，進行相關地區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就是中川學。

1966年，中川學率先在《一橋論叢》上發表〈華南客家史研究序說〉一文。之後便以《一橋論叢》為重要學術平台，接連發表〈中国・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客家の歴史的位置について〉(1973年)、〈中国客家史研究の新動向〉(1977年)等相關研究論文與評論。1980年，中川學將其過去客家研究的成果，集成於《客家論の現代的構図》一書。中川學重視客家的起源和形成問題，以及